

是党给了我新生

(功勋教授 杨文汉)

杨文汉,男,1934年6月生,陕西兴平人,我校政治经济学学科主要创建人,政治经济学专业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9年11月起先后在咸阳干校、中国人民大学经贸系和研究生班、陕西省计委物资局、西安政法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工作和任教;1955年5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至西北政法学院工作,曾任理论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陕西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2003年3月退休。代表作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纲》《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步骤》等。2018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2021年荣获“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是党救了我

1934年农历6月15日,我在陕西省兴平县(今为兴平市)西吴乡(今为西吴镇)来祁寨出生。家里世代以农为业,没有一个读书人。我的爷爷是一个长期出卖劳力的农民雇工(当地叫长工),他每年都要受雇于富人之家,为他们种田,由他们支配一切,村子里的人都叫他“长工王”。由于过劳,爷爷晚年双目失明,长期躺在炕上,由母亲和婶婶照顾。我的父亲也是农民,他非常勤奋,农业方面的技术活几乎都会干,是个务农的行家,他年轻时也当过长工,为富人家种田。父亲为人正派,很讲义气,为人厚道,对三个儿子疼爱有加。我的母亲是典型的农家妇女,她裹了脚,一字不识,也没有给后代留下名字,但她的慈爱和善良却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终生受益。

父亲有一个小舅,年龄比他小十几岁,叔父和婶婶两口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是家里主要劳动力。由于家里有父亲和叔父兄弟俩,便成为了国民党政府征兵和抓丁的对象,为此,全家人常处于恐惧和不安之中。

解放前,我家有坡地和平地共三四十亩,耕牛一头。按理说,只要不发生自然灾害,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可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征粮征兵,家庭经济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有这样一件小事,迄今记忆犹新:初二二年级时,学校里来了一个卖文具的小商贩,我当时需要买一支毛笔,于是就请假回家向父亲要钱,父亲不在家,家里人说他去地里耕地了。我当即追到地里,见了父亲后说,我没有毛笔,无法完成作业,需要买一支毛笔。父亲说,他没有钱,拖一拖再说。我说不能拖,一定要买。这样我就跟父亲软磨起来,他耕地不停,我软磨也不停,他转一个来回,我跟一个来回,他转两个来回,我跟两个来回……父亲实在拿我没办法。后来他就想出来一个办法说:“你从鸡蛋罐罐里拿上三个鸡蛋,换一支毛笔。”他说,“你只能拿三个,不能多拿,你妈以后追查,我就给你解,你不要怕。”这样矛盾才解决了,只见当时家里的困境。这样的家境对我以后养成吃苦耐劳、勤奋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七岁时开始在本村读小学,四年后考入茂陵高小,1948年夏从茂陵高小毕业,顺利考入兴平初级中学。上中学时,因家贫没有条件搭灶,我只好靠背馍度日。馍是由麦面和玉米面各半混合而做成的锅盔,一周背一次,来回30里,我每天都吃开水泡馍,油菜不沾,就这样生活都难以维继。1949年春节过后,父亲对我说“今年春天,咱家的日子很难熬过去,七、八口人吃饭,口粮还缺一个月,现在我要和你叔叔集中解决这个问题,你要的学费确实实在在拿不出来,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念书了,回家务农好不好?你说呢?”我说什么呀?我能说什么呀?我只能认了,只好从此失学。这对我心灵的刺伤和精神的打击太大了!太大了!心里难以承受。

失学后,我常想:像我这样只读了一学期初中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能有啥前途?自己没文化,没技术,可怎么生活呀!受人剥削受人压迫是肯定无疑了,那时一切都是可怕的……现实就是这样,自己又有啥办法呢?有时,我在地里劳动时想起失学这个事,想着想着就偷偷地哭,哭完后抬起头一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环顾四方谁也救不了自己,未来是一片漆黑。

有一天,我下地劳动回来,在路上碰见我初

小时候的刘哲老师,他主动问我:“你念书念的那么好,为什么不念了呢?你真傻!”一句话刺痛了我的心,我当即哇哇地哭了起来,我心想,你太冤枉我了!正当我处在悲痛、茫然、无助的时候,这一年的5月份西安解放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人民解放了,天亮了,我在绝境中也获得了新生。

大约1949年11月,成阳地委干部训练班在成阳公开招收学员,在父亲的允许下,经亲朋介绍,经干训班审查批准,我参加了该干训班的学习,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1950年初,学习尚未届满,我就被转到陕西省土改干部训练班去学习。省土改干训班的任务是为下半年进行土改作准备,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划分阶级成份,如何计算地主、富农的剥削量,以及进行土改的方法、步骤,学习的方法主要是听报告,联系案例进行讨论,报告人主要是省政府的正、副主任和副主席等等。

省土改干训班是短期培训,大约六月初学习就结束了,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兴平县和宁强县相继参加了两年土改。两年土改工作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使我的思想得到升华。首先,通过农民忆苦思甜,使我彻底弄清了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地主养活雇工”的歪曲谬论被彻底颠倒过来,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历史的推动者,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初步树立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其次,在点点滴滴的相处中,大大提高了我对农民的爱,它成为推动我爱国、爱党的动力。当时土改队里有一名年轻的队员名叫李树槐,会唱《歌唱祖国》,他常站在山上放声高唱,每当我听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看看眼前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主人,又看看自己的今昔变化和切身的感触,我的双眼就含满了热泪,内心充满着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感激之情,誓言今生一定要做党的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党培养了我

1952年土改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西北合作事业管理局干部处做人事干事。西北合作事业管理局是西北大区级面对陕甘宁青新五省的一个事业管理机构,上下联系都是公文和报告,而我的文化水平低,既不会写报告,也不会写公文,困难重重,只能做一些接待服务工作,前途渺茫,令人担忧。因此,我就萌生了去上学、提高文化水平、改变目前这种与工作极不适应的状况的想法。

1953年,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急需大批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人才。这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来陕招收经济类专业的本科学子。我鼓起勇气,把我想考人民大学的想法向局里领导汇报。局领导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来西合局后,表现很突出,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吃苦、任劳任怨,群众关系也好,是我们党支部培养的人党对象。如果你不走,年内就有可能解决入党问题。如果你走了,对方还要了解你,这样你的人党问题肯定会拖一拖,你好好考虑一下。”经过考虑之后,我对他说:“如果我够了党员标准,走到哪里都会吸收我。时下,中国人民大学在陕西招生,机会难得,我想抓住这个机会。”



领导看我决心很大,讲的又有道理,就爽快地说:“那你就到北京去考,考上了你就上,考不上你还回咱局,仍做你现在的工作。”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你考上了,上学期间还有啥困难需要帮助,还可以给咱局里写信,我们尽力为之。每年寒暑假回家路过西安,就到咱局里来,咱局里有接待室给你方便。”听了这一席暖人心的话,我感动地当即掉下了眼泪。此情此景,迄今还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年陕西省供销社和西合局一共有5个人上北京应考,考试地点在东北铁狮子胡同中国人民大学校部。考完不久,结果就出来了,在党的大力支持下我考上大学,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考学成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使我成了和我非常羡慕、日夜追求的那些大学生一样的人了!将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了!我内心的高兴、喜悦、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是年9月,我便进入了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系,学习供销合作专业。

1953—1957年的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四年,这四年我的学费、实习费、调研费、医疗费以及所有的教材费全由国家承包,学校每月还给我发25元生活费,除伙食费12.5元外,剩余12.5元足够我日常开销,因而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大一第一学期共开了四门课,其中一门是考查课,三门是考试课,这三门考试课就是《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俄语)。考试实行五分制,3分为中,4分为良,5分为优。期末考试,出我意料,我的三门课全是优,当时这在全班是极少极少的。

1955年5月15日,我终于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多年来的梦想,之后我又被选入经贸系团总支,任团总支书记。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之后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努力工作。在学习和工作中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全铭刻于心。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时时起带头作用。

1957年7月末,我被分配到陕西省物资供销局,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省物资供销局所对应的物资是指生产资料,是由计划调节的,而我所学的供销合作是个人消费品,是由市场调节的,两者运行方式根本不同。这时我深感用非所学,但我仍然安心好好工作,回报人民的培养。1958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物资供应变得极为紧张。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我深切地感到如果自己不做点改变,就会庸碌一生,无所作为,于是产生了离开这里去读研究生的想法。

机会终于来了。这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来陕招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我鼓起勇气把我要读研究生的想法给局领导讲了,局领导未加

思索就一口回绝了,他说:“你已经上了大学!现在省物资局还有好多人没上过大学,你还不知足,还想上研究生,没门!回去好好工作去!”我很失望,也很难过。当时我的好友给我出主意说:“省物资局受省委工交部领导,你可向省委工交部谈一谈,请他们帮帮忙。”第二天我就找了省委工交部,接待我的是组织处袁恒茂同志。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立即给予坚决支持,事后他反复给省物资局帮帮忙,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急需培养一批熟读马列著作的干部,杨文汉是中国人民大学供销合作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是共产党员,身体又好,学习又好,符合报考的条件,我们应支持他报考,考不上是他的事,如果我们不让他考,那就成了我们的责任!”

在袁恒茂的大力支持下,省物资局领导终于同意了。这时离考试只剩下四五天了,我来不及复课就上阵应考。当年政治经济学论文考题出的很大、很难,现实性很强,题目是“西藏的反革命叛乱与尼赫鲁的哲学”,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叛乱的原因、性质,以及失败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尼赫鲁的种种谬论,成绩还不错,这样我就被录取了。这一录取,基本上确定了我以后的发展方向——从教。

1959—196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认真地攻读了三年马列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这三年,我们读书读的很苦,老师要求我们不但要读懂,而且要熟记,考试时要让我们背名段名句。除了专业课,学校还要求我们外语(俄语)要过关,达到能阅读的水平。古文课也要熟背几篇。由于我的刻苦努力,上述要求我都基本达到,成绩优良。三年攻读,虽然很苦,但苦中有甜,它为我后来从教奠定了坚实而良好的基础。

是党不断激励我向上向善

1962年8月,我拿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回到陕西省委接受再分配。这时接待我的仍是袁恒茂同志,他那种热忱、细心、认真的工作态度实在令我感动。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时期,高等学校都在压缩人员,一般不招人,但各学校都给研究生开绿灯。袁恒茂先后给我介绍了几所学校,由于不理想,我都不接受。袁恒茂对我的不接受很理解,说不合适就不去了。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最后我终于选中了西安政法学院,因为该校是文科学校,又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特缺,要求迫切,这样我就走进了这所学校,走上了从教的道路。

1962年10月中旬,我来到西安政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2月就随1963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同学讲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斯

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本经典著作,反响尚好。此后我又给66级、67级、68级同学讲了政治经济学部分章节,还兼任过班主任,下班后和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段时光对我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我很开心。

1966年春,正当我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走上熟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期间,学院惨遭破坏,我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这时西安交通大学已开始招生,我一去就参与教学,给电机系的学生上课,业务水平很快得到恢复。半年后,我被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列教研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与乔宗寿副教授搭档,我们合作的很愉快。

根据新时期经济建设的要求,1978年国务院决定恢复西北政法学院,是年9月,西北政法学院王云院长委托人事处处长任山同志到交大找我,叫我回学院工作。与任山处长谈话后,我很受感动,心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年轻教师,老院长还知道我,记得我,专程派人叫我回去工作,这是看得起我,是抬举我。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便一口答应回去工作。回校之后,我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在政治理论系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复校初期,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仅有八、九名教师,面对全校的公共课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专业课,人力远远不够。为了搞好工作,我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积极引进交大政经教研室好的管理经验,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第二、自己带头冲在前面,挑重担,担大责,拼命工作,争取把以前的损失补回来。我先后为79级、80级、81级、82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同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领导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等课程。同时,还给79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专题。除此之外,还带同专业毕业实习、做专题调查、指导毕业论文,参与毕业鉴定和分配,推行全方位服务,效果非常明显。

80年代初,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战线上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上课时同学不断提出这些问题,为此我和刘克鉴老师、孙振济老师、郭志琦老师深入工厂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先后撰写了《西安市理发行业实行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工资制度的调查》《孟家坪专业分工包产到劳的做法》《中华皮件厂扩大自主权试点调查体会》《开拓农村流通渠道的一种好形式》等一系列有分量的调查报告,获得了有关部门的好评。

80年代初,高校全面恢复了中止10多年的职称评定工作。1982年春,西北政法学院也启动了这项工作,经过反复评比,首批全校评出8名副教授,我便是其中之一。那一年我48岁,是8位老师中年龄最小的,因而在全校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又经过5年的努力,在1987年顺利晋升为经济学教授,1988年获评司法部先进教师,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8年11月,学校授予我“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对于殊荣,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把这些荣誉都视为对我的激励,对我的鞭策,是督促我不能自满,不能止步,要更加努力,要不断向上向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都是在这种精神的鞭策下努力工作,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对待重责,力争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党的培养。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2013年11月15日,79级政经班同学和80级、81级政经班部分同学为我举办了80华诞庆贺会。在庆贺会上,我对自己的生作了小结,现转载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出生于农村,是农民的儿子,解放前没有接触过书本,四处碰壁。解放后,是党和国家一手培养了我,送我上大学,读研究生,进高校当教师,升教授,结婚成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可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很知足,也很感恩,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这种热爱,感情已渗入血管,融入血液中。从事教学后,我教学认真,科研努力,热爱学生,桃李满天下。

回顾过去,我深深地认识到爱党爱国对于一个教师的重要性,只有怀着一颗爱党爱国的

心,才能教育出为中国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才。

从1921到2021,我们的党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光辉历程。在这个历史节点,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对党油然而生一种真诚敬意,都会感叹建党100年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中国共产党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百年红船领航路 砥砺前行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商学院 李昊宇)

红船劈波行,开启新航程

曾几何时,烟雨南湖,一叶红船劈波斩浪,缓缓驶入漫漫历史长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小小红船载千钧,播下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跨世纪的航程”。红船虽小,却承载着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希望。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红船精神”的本质和内涵的

科学总结和精准阐释。“回首近代,百年三万六千日,饱尝民族苦难,历经变革风霜。烽火硝烟,江山激昂,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断梁,春风又绿神州,华夏再沐朝阳。”就如同朱相远先生在《中华世纪坛序》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在血泪中崛起,中国共产党不会畏惧任何艰难险阻。

曾几何时,腐朽不堪、羸弱不堪、困

苦不堪的中国危在旦夕,面对列强的炮火与硝烟,彼时的中国毫无招架还手之力。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道声音,从一艘小小的红船上传来“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共产党,我们要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至此,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带领中国走上革命道路。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八一起义、井冈山会师等顺利开展,只有进行武装革命才能为中国赢得一线生机,只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才能让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中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阶段,党所面临的困难重重,挑战频发,首创精神、奋斗精神以及奉献精神构成了“红船精神”的精髓。

风雨共兼程,开辟新天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努力拼搏。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立于高大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们为之贡献出了自己的热血青春,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在战争年代,有年轻的刘胡兰英勇就义,有江姐在歌乐山留下《红色遗书》,有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等;在和平年代,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同志,有一心进藏区为人民努力工作的孔繁森,有党员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等先进个人,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最后一丝力量。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一封封带有党员同志鲜红手印的

请战书在第一时间被交到了各基层党组织,一个个怀揣着理想与信念的党员和医护人员,纷纷请缨前往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有已燃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也有才新婚不久的妻子或丈夫以及刚刚成为妈妈的年轻母亲。疫情当前,面对国家的呼唤和人民的需要,他们将个人安危置于身后。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国家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效控制了疫情。疫情面前,数以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守护着我们平安、安康的幸福生活。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由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在刚刚过去的疫情阻击战中,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牢牢采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原则,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脱贫攻坚战中,始终坚持“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理念,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在抗洪抗涝、防汛救灾的现场,始终坚

持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信念,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人民至上,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般存在的历史真谛。

100年风雨兼程,100年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带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们不断奋斗,谱写中华民族不断进步向前的壮美诗篇。

奋斗百年路,砥砺前行程

运海扶扶,必借垂天之羽;乘流击汰,必仁云之楫。《周易》中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从当初的贫穷落后到如今的繁荣昌盛,离不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国人在党闪烁着光芒的思想照耀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今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引领“中国号”巨轮,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悟空”升天,“嫦娥”奔月,“天宫”高悬,“天眼”落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绩令人鼓舞,前景催人奋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和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乘风破浪正当时,不待扬鞭自奋蹄。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新的传奇正在神州大地上书写。

